

DOI:10.3969/j.issn.1672-1101.2025.05.004

论“淮楚文化”

——兼与“荆楚文化”“湘楚文化”“巴楚文化” “吴楚文化”的学理比较

高 旭

(安徽理工大学 淮南子文化数字化传承与发展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实验室, 安徽 淮南 232001)

摘 要:淮河流域是中国楚文化极为重要的历史衍生地,从古至今,蕴积了甚为丰厚的楚文化历史遗产。以淮南地域为中心的淮河中游地区,在楚文化的演变发展里,占据着特殊的地位,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是当代淮河流域楚文化的最重要的体现者和代表者。从流域性视角出发,明确提出界定“淮楚文化”的学术概念,不论是对淮河流域楚文化研究,抑或是对淮南地域楚文化研究,都具有显而易见的必要性、重要性及迫切性。只有从学理上剖析阐明“淮楚文化”的丰富意涵,将其同“荆楚文化”“湘楚文化”“巴楚文化”“吴楚文化”等诸多的区域性楚文化概念区别开来,准确把握其显著的流域性、地域性特色,才能为“淮楚文化”的传承发展提供坚实有力的学术支撑,促使其被开拓成为中国楚文化研究中颇具学术前景的新领域,进而既为当代楚学研究注入新的动能活力,也为安徽楚文化发展带来新的学术认知与变化。

关键词:楚文化;楚学;淮楚文化;淮河流域;淮南地域

中图分类号:B23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1101(2025)05-0022-19

On Huai-Chu Culture

——A Comparative Theoretical Study in Relation to Jing-Chu, Xiang-Chu, Ba-Chu, and Wu-Chu Cultures

Gao Xu

(Anhui Provincial Key Laboratory of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for Huainanzi Culture Digital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Anhui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uainan, Anhui 232001, China)

Abstract: As the historically significant regio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hu culture in China, The Huai River basin has accumulated a rich legacy of Chu cultural heritage over the centuries. The middle reaches of the Huai River, centered on the Huainan region, holds a special position in the evolution and development of Chu culture and has exerted a profound historical influence. It is the most important embodiment and representative of Chu culture in the Huai River Basin in contemporary tim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river basin, clearly putting forward the academic concept of defining Huai-Chu culture is of obvious necessity, importance and urgency for

收稿日期:2025-06-30

基金项目:2023 年度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淮南子》道家性命哲学研究(23BZX024);2022 年度安徽高校协同创新项目:《淮南子》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创新研究(GXXT-2022-097)

作者简介:高旭(1979-),男,陕西延安人,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淮南子学、道家思想史、淮河文化、楚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创新。

both the research on Chu culture in the Huai River Basin and that in the Huainan region. Only by analyzing and clarifying the rich connotations of Huai-Chu Culture from an academic perspective, distinguishing it from many regional Chu cultural concepts such as Jing-Chu Culture, Xiang-Chu Culture, Ba-Chu Culture, Wu-Chu Culture, and accurately grasping its distinct basin and regional characteristics, can provide the solid and powerful academic support for the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Huai-Chu Culture, promote it to be developed into a new field with considerable academic prospects in the study of Chinese Chu culture, thereby not only injecting new impetus and vitality into contemporary Chu studies, but also bringing new academic cognition and changes to the development of Chu culture in Anhui.

Key words: Chu Culture; Chu Studies; Huai-Chu Culture; Huaihe River Basin; Huainan Region

长期以来,学界对淮河流域楚文化、淮南地域楚文化的历史发展脉络与学理内涵关注程度相对不足,相关研究成果也较为有限。然而,随着安徽省淮南市“武王墩一号墓”的惊世发掘,如何重新审视淮河流域、淮南地域在中国楚文化发展进程中所具有的独特价值、地位及影响,已然成为学界迫切需要深入审思并开展系统研究的重大课题。为推进这一研究,身为淮南本土的楚文化研究者,笔者不揣冒昧,尝试运用“十论”的专题论述方式来具体阐释自己现阶段的一些初步见解,以求教于方家。尚祈不吝赐教,共同研讨交流。

一论“淮楚文化”

“武王墩一号墓”的考古发掘,又一次充分印证淮南市拥有极为丰厚且独特的楚文化历史遗产与资源。无论是对先秦楚国发展史研究,还是对先秦秦汉时期楚文化演变史的探究,它都具有不容小觑的价值与地位,是中国“楚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楚文化在安徽最显著、最具影响力的历史体现,是在皖北淮河流域,特别是以现今寿县(战国时期的“寿春”,楚国最后一个“郢”都)为楚文化中心区域的淮南市。与楚文化在其形成、发展、兴盛的核心区域湖北荆州市(纪南城遗址所在地)被称为“荆楚文化”不同,在楚国历史发展的“归宿地”、楚文化最重要的“承载地”之一的安徽省淮南市,学术文化界提出用“淮楚文化”这一概念来指称楚文化^[1],以此反映淮河流域对楚国史、楚文化演变产生的重要影响,同时也揭示出淮南市在淮河流域楚文化发展中所具有的独特作用与地位。

从地域文化视角着眼,先秦秦汉时期楚文化的发展并非仅仅体现为单一地域的历史内涵,而是有着丰富的多样性,其影响范围远超现今湖北一地,实

际上现今的湖南、河南、安徽、江苏、浙江、四川、山东、广东等地也被涵盖其中。尽管以“荆楚文化”来一般性指称楚文化存在合理性依据,且为学术文化界普遍认可,但若认为“荆楚文化”可在完全意义上等同于楚文化,就会出现忽视楚文化复杂多样的地域性发展特点的局限,这并不利于人们对楚文化发展内涵形成更为深刻精准的历史认知。“淮楚文化”概念的提出,有助于人们重新认识楚文化演变发展的复杂历程和丰富内涵,为学术文化界进一步深化“楚文化”的研讨提供了新的契机。

(一)概念界定:广义与狭义

论及“淮楚文化”的概念,需先对“楚文化”有清晰明确的认识。楚史专家张正明先生曾指出:“楚文化因楚国和楚人而得名,是周代的一种区域文化……所谓楚文化,不是一个单一的概念,而是两个大小套合的概念。考古学上的楚文化,以体现在考古遗物上的为限,主要是物质文化。历史学上的楚文化,则是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总合”^[2]。尽管考古学上的“楚文化”同历史学上的“楚文化”存在一定的区别,但很明显,后者能够包含前者,能更好地揭示出楚文化丰富多彩、博大精深的内涵。因此,认识和把握“楚文化”,既不能脱离考古学的成果,也不宜仅仅局限于考古学的范围,而是应从更广泛的“文献”(考古资料、传世文献资料、民俗资料等)意义上展开系统研究。

“淮楚文化”以“楚文化”概念为基石,其内涵包括广义与狭义两个层面。从广义而言,它指的是先秦至秦汉时期,淮河流域受楚国历史影响形成的带有显著楚风特色的物质文化产物与精神文化成果。淮河流域覆盖现今河南、安徽、江苏三省近半的面积,以及湖北、山东两省的部分地区,而在楚国八百余年的发展历程中,现今淮河流域所覆盖五省均曾

不同程度受到楚文化的直接影响,其中尤以河南、湖北、安徽、江苏为著。基于此,“淮楚文化”这一概念,从广义上说,理应是针对整个淮河流域而言的。从狭义上看,在如今淮河流域的各地区中,除安徽省淮南市外,尚未有任何一地明确提出“淮楚文化”的概念,并以之来揭示、界定和标识自身富有地域性特色的楚文化蕴涵。故而“淮楚文化”在狭义上可用来特定指称如今淮南地域范围内存在的、先秦秦汉时期因受到楚国历史影响而形成的、带有显著楚风特色的物质文化产物与精神文化成果。如若说广义上的“淮楚文化”是一个宽泛的大概念,那么狭义上的“淮楚文化”便是一个有着明确特指的小概念。

(二)与“荆楚文化”概念的比较

长久以来,“荆楚文化”相当于是“楚文化”的同义词,在所有关于“楚文化”的概念中,没有哪一个概念像“荆楚文化”一样深入人心,被学术文化界和社会大众广泛认可与接受。但若深究,“荆楚文化”虽能代指“楚文化”,可“楚文化”却不宜简单等同于“荆楚文化”。尽管“就地理框架来说,荆楚就是长江中游地区……只有宜昌以西一段伸进了长江上游地区的东缘,止于巫山……就文化氛围来说,荆楚就是楚人的本土”^[3],而且楚国早期历史发展与现今湖北境内的“荆山”密不可分,但仍需指出,在楚国八百余年的历史演进中,淮河流域同样占据着重要地位,尤其是公元前278年秦国攻破楚郢都,楚顷襄王被迫徙都于“陈”(今河南省周口市淮阳区)后,楚国后期政治中心彻底转向淮河流域,一变以“江”为本而成以“淮”为主,由此开启了楚文化发展的新篇章。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过于片面地强调“荆楚文化”,易使人局限于楚文化在长江流域的发展和成就,却忽视其在淮河流域的重要发展及影响,这并不利于人们充分认识楚文化所具备的多样化地域内涵。“淮楚文化”这一概念的提出,便于同“荆楚文化”相互参照,为学术文化界更深入地研讨楚文化的复杂性、为社会大众更深刻地理解楚文化的博大精深提供有益的启示。

(三)与其他相关概念的辨析

学术文化界现有与“淮楚文化”密切相关的概念还有“陈楚文化”“寿春楚文化”“楚淮文化”“淮南楚文化”“江淮楚文化”等。

“陈楚文化”是河南学者对周口市特色地域文化的指称。周口市淮阳区是古“陈”地,以太昊氏为

首领的东夷部落世居于此。西周初期为陈国封地,直至公元前479年楚国灭陈,此地被置为县。战国后期,楚顷襄王徙都“陈”,“郢陈”作为楚国后期政治中心长达38年。河南学者认为,“楚文化与这里的东夷文化和华夏文化相互交融,从而形成一种多元复合型的陈楚文化”^[4]。淮阳区地处淮河上游北岸,处于黄淮之间,“陈楚文化”在反映淮河流域楚文化蕴涵的同时,也体现出黄河流域历史文化因素的深刻浸染。

“寿春楚文化”“江淮楚文化”“楚淮文化”“淮南楚文化”等概念均为安徽学者提出。2016年1月,寿县从六安市正式划归淮南市。在此之前,受行政区划特定历史因素影响,寿县楚文化研究者曾用“寿春楚文化”来指称作为“拥有大量楚文化遗存的胜地”的寿县所代表和反映的楚文化^[5]⁸;在此之后,研究者又用“江淮楚文化”来整体性指称长江、淮河流域的楚文化,并指出“江淮楚文化,不但是中国楚文化的主要部分,而且是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6]。研究道家学说的安徽学者提出“楚淮文化”概念,以此探讨先秦老庄道家^[7]、汉代淮南黄老道家^[8]¹⁹⁴所受楚文化、淮河文化的深刻影响。“淮南楚文化”是当前淮南市学术文化界对淮南地域范围内一切带有先秦秦汉时期楚文化独特印记的物质遗存与精神产物的指称。以上四个概念中,“寿春楚文化”范围过窄,难以契合当前淮南市楚文化研究的现状与需求;“江淮楚文化”范围过广,无法凸显淮河流域楚文化及淮南地域楚文化的特殊价值与意义;“楚淮文化”概念虽和“淮楚文化”提法接近,但因主要从道家学说研究角度提出,而非基于“楚学”视角,故仍无法更精准地反映淮河流域楚文化演进的整体趋势、内涵及特点;相较于前三者,“淮南楚文化”的概念与“淮楚文化”最为契合,其不足之处在于,仅能体现出后者狭义的一面,而广义的另一面则付之阙如了。

综上可知,“淮楚文化”这一概念能够兼顾阐释淮河流域、淮南地域楚文化历史发展情况的双重诉求,其学理研讨空间更大、内涵更丰富、特色更突出,更适合当前淮南市楚文化研究的需要,有利于形塑新的城市特色文化名片,扩大淮南市楚文化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且对深化并丰富民众对楚文化的地域性认知大有裨益。如果说“荆楚文化”是楚文化最重要、最有代表性的体现者,那么“淮楚文化”同样是展现楚文化博大精深内涵的重要承载者,其独特的

地域性价值及意义不容轻忽。

二论“淮楚文化”

任何一个具有生命力的学术新概念的提出,都有其特定的现实缘由与学理诉求,绝非轻率而论。当前提出并阐释“淮楚文化”这一重要概念便是如此。

从现实缘由来看,“武王墩一号墓”(战国楚考烈王墓)的科学考古发掘,再次让世人充分认识到淮南市所拥有的楚文化历史遗存的丰厚性、特殊性与重要性,也使学术文化界掀起了前所未有的研讨安徽楚文化、淮南楚文化的热潮。正是在这一形势的影响下,如何深刻且准确把握“淮南楚文化”在中国楚文化中独特的历史地位、价值及意义这一重要课题,自然而然地摆在了人们面前。也正因如此,着眼于楚国中后期发展与淮河流域之间,以及与古“寿春”(“寿郢”)所在的淮南市之间的特殊关系,上文尝试提出“淮楚文化”的新概念来予以揭示和反映,并从广义与狭义两个方面对这一概念进行了界定,认为只有兼顾“淮河流域”与“淮南地域”的双重视角,才能较为清晰地看出淮南楚文化的特殊性所在,也才能进一步揭示出淮河流域楚文化“同”“异”于长江流域楚文化的地方,从而推动中国楚文化的深化发展。由此可见,如果没有“武王墩一号墓”这一重大考古契机的出现,“淮楚文化”概念的提出便缺少强劲的现实动力;即便得以提出,其学术影响、社会反响,也必将大为减弱,无法对淮河流域楚文化、淮南楚文化的研究阐释与发掘利用发挥出最为有力的促进作用。

就学理诉求来说,则具体表现为三个方面:

一是原有的楚文化概念难以准确反映淮河流域楚文化、淮南楚文化的发展情况,更无法凸显后者在楚文化演变史上的特殊地位及影响。在楚史、楚文化研究中,使用最多、影响最大、认同度最高的概念是“荆楚文化”。“荆楚文化”的概念是历史形成的,有学者曾明确主张:“历史上荆、楚不分,荆、楚或荆楚、楚荆作为一种特定的称谓,已沿袭三千多年了”,因而“楚文化、荆楚文化同属一个概念,均指楚人(族)、楚国创造而长期沉淀的文化实体和形态”^[9]。用“荆楚文化”指称“楚文化”,从整体上反映楚文化的历史存在及内蕴,确有其合理之处,也得到了学术文化界在内的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可。但这一概念在

具体使用过程中,明显存在一定局限性。以往楚史、楚文化的学者(尤其是湖北省的学者),在潜移默化间习惯将“荆楚文化”等同于“湖北楚文化”或者“长江流域楚文化”的概念来运用,对淮河流域楚文化的历史发展,存在某种程度的忽视,甚或轻视。比如有学者认为:“荆楚文化,有人将它作为湖北文化的代称”或“代名词”,“以地区中心论又主要是指两湖文化”^[10],还有学者提出:“我们说的荆楚地区,是指以如今的荆州为中心的两湖地区(即湖北、湖南两省),而江汉地区则是其腹地。所以,所谓荆楚文化,从创造者角度而言,是楚人(族)楚国创造的文化;从地域角度来讲,是以荆州为中心的江汉至两湖地区(当然也包括江淮地区)的文化”^[9]²³。强调“荆州”与“两湖地区”是楚文化历史发展的核心地域,从先秦楚国发展的实际情况来看,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也应指出,这种看法并不全面,同样存在一定的偏狭。因为这种认识没有准确把握到,从春秋中后期到战国末期,楚国长期经营淮河流域(自公元前七世纪后期楚文王“伐蔡”“灭息”开始,楚国势力就已深入淮河上游地区,并日益控制了东进淮河流域的交通要地),甚至逐渐将政治重心从江汉流域迁移至淮河流域的客观情势。淮河流域对于楚史、楚文化的演变发展所具有的特殊性、重要性,是无法用一个“当然也包括江淮地区”来轻轻“含括”与“带过”的。基于此,为更进一步揭示淮河流域楚文化、淮南楚文化不同于长江流域楚文化、荆州地域楚文化的特殊性,客观界定前者在中国楚文化发展中应有的地位,便需探索性提出“淮楚文化”的概念来弥补不足、更新旧知。

二是淮南楚文化在淮河流域楚文化、安徽楚文化、中国楚文化中的特殊地位也亟需辨析厘清。随着2016年1月寿县正式划归淮南市,这座历史上著名的楚“郢”都,“楚文化的故乡”,同淮南市一道整合,成为江、淮流域底蕴最深厚且最具代表性的楚文化遗存密集地之一。“两座楚王墓、一座楚郢都”就此成为淮南市楚文化历史遗存的鲜明标志,而淮南市也成为目前国内已知楚文化考古发掘中,唯一拥有“两座楚王墓”(实则为“两座楚王陵”)的城市。李三孤堆的“楚幽王墓”、武王墩的“楚考烈王墓”均有相应严格的陵寝規制,并非仅有“王墓”;前者因民国时期被盗掘而遭到彻底破坏,后者则在抢救性考古发掘中得以证实并逐步呈现。这充分说明淮南楚文

化历史资源极为丰厚,实有其他有楚文化遗存的城市难以所及之处。更遑论,现代学术意义上的“楚文化”学科即是因淮南地域“楚幽王墓”的横空出世而奏响历史的“序曲”^[11]导言:2。现今淮南地域仍存在大量的“孤堆”古冢,这其中又不知有多少楚文化遗存的宝贵蕴藏!以往学术文化界不仅对淮河流域楚文化发展成就认识不足,而且对淮南楚文化的关注度、重视度也较为有限,这并不利于我们在新的条件下对中国楚文化形成更为全面和更加深入的历史认知。借助“武王墩一号墓”的重大考古契机,从学理上重新审视和研讨淮南楚文化在淮河流域楚文化、安徽楚文化、中国楚文化中的地位及影响,自然成为当前学术文化界必须高度重视的基础性课题。正是由于淮南楚文化发展的深厚底蕴、丰富资源、广阔前景,才确有必要、迫切需求提出“淮楚文化”的新概念来“定位”淮南楚文化,将其独有的历史蕴涵及风韵充分彰显出来。

三是准确界定“淮楚文化”的学术新概念,是逐步拓展形成楚文化研究新领域的重要基础,也是促进学术文化界重新审视楚文化“江”“淮”内涵异同性的重要前提。提出“淮楚文化”这一概念,必将引起学术文化界对淮河流域楚文化、淮南楚文化的新的反思,促使研究者们逐渐摆脱以往楚史、楚文化研究重“江”轻“淮”,且对淮河流域楚文化缺少整体性探讨的局限。在“淮楚文化”的概念基础上,学术文化界能够更深入地把握淮河流域楚文化发展的相对独立性,更透彻地剖析出淮河流域楚文化同长江流域楚文化之间的“同”与“异”来,进而开拓出淮河流域楚文化、淮南楚文化的新的研究领域,丰富现有的中国楚文化的学术内涵。在波澜壮阔的历史演进中,楚文化所具有的“六大支柱”(炉火纯青的青铜冶铸、绚丽精美的丝织刺绣、巧夺天工的木竹漆器、义理精深的老庄哲学、惊采绝艳的屈骚文学、恢诡谲怪的美术乐舞)、“五种精神”(筚路蓝缕的艰苦创业精神、追新逐奇的开拓进取精神、兼收并蓄的开放融汇精神、崇武卫疆的强军爱国精神、重诺贵和的诚信和谐精神)的根本内容在“江”“淮”流域保持着一致性、连贯性、稳定性^[12],但也必须看到,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江”与“淮”毕竟是有着不同自然禀赋及特点的大河,楚文化在二者流域范围内的流变发展不可能全然相同,而是必有其内在差异之处。故此,在“荆楚文化”之外,提出“淮楚文化”的概念,

能够推动楚文化的研究发展面向淮河流域、淮南地域别开生面、再创新识。

由上可知,“淮楚文化”概念的提出,既是应科学考古之“机”而为,亦是应楚文化拓展深化发展之“需”而论,这两方面的动因都与地处淮河中游要地的淮南市有着至为紧密的关系。正因淮南市(战国晚楚“寿郢”所在地)在淮河流域楚文化发展史上拥有独一无二的历史地位,所以“淮楚文化”这一概念在狭义上用来特指“淮南地域楚文化”或“淮南楚文化”,最能凸显出淮河流域楚文化的精神风采与独有神韵。

三论“淮楚文化”

关于“淮楚文化”概念的讨论,是当前安徽省内、淮南市内楚文化研究者尤为关注与聚焦的重要议题。对何为“淮楚文化”,上文已提出初步的看法,力图准确界定这一概念的基本内涵。但就目前讨论情况而言,围绕“淮楚文化”概念形成较为广泛的学术文化共识并非一蹴而就之事,以下三方面的问题尤需要楚文化研究者进一步深入研讨:

一是“淮楚文化”概念极为显著的地域性特征。“淮楚文化”概念的提出,既有学理层面的缘由,也有现实考古发掘成果的刺激。长期以来,论及“楚文化”,学者们基本都将以湖北地域为“源头和主干”的“荆楚文化”视作主要对象,惯常用“荆楚文化”来指称“湖北文化”,认为“荆楚文化是湖北的雅称”^[13],潜移默化中将二者等同为一。从学理上看,这自有其特殊的历史缘由和立论基础,恰反映出今天湖北地域同先秦时期“楚国历史发展”及“楚文化演进”之间的极为紧密的关联性。但随着2020年以来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联合对“武王墩一号墓”开展抢救性考古发掘不断取得重大成果,该墓被确认为是迄今为止所发现的楚国最高等级墓葬,墓主人进而被考古学界锁定为战国晚期的楚考烈王熊完,淮河流域、淮南地域在楚文化发展史上的特殊性、重要性问题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凸显,这“刺激”着安徽省内、淮南市内的学术文化工作者重新反思和深刻认识“楚文化”同淮河流域、淮南地域之间的历史关系,由此促动了“淮楚文化”概念的提出。在楚国八百余年的历史发展中,湖北地域无可置疑拥有“源头”的地位,但是否能被简单看作是“楚文化”的“主干”,是否能用“长江流域”楚文化的发展片面地遮蔽

“淮河流域”楚文化的发展角色、作用、地位及影响,这一课题很值得人们着眼于考古新发现重新审视。从春秋到战国,楚国历史发展的“重心”有着变“长江流域”为“淮河流域”的重大转型,尤其是楚顷襄王时期因受“秦”逼而迁都于“陈”后的发展,楚文化在楚“先王”们长期经营淮河流域的基础上,加速同淮河流域文化紧密结合,促使“荆楚文化”与淮夷文化愈益实现深度交融^[14],其身上的“淮水之风”日益浓烈起来^[15]。实际上,楚国后期的历史发展决定了楚文化演进后期的“主干”并非能用“长江流域”的内涵所完全含括,而是“长江流域”与“淮河流域”并重、共融为“主干”的“新主干”。只有对楚文化的淮河流域内涵及特征展开更为系统的研究,才能深化与更新旧有的学界认知,揭示出中国楚文化丰富复杂、博大精深的历史内蕴。

二是“淮楚文化”概念的泛指与特指。使用“淮楚文化”这一概念,必须注意辨析实际内涵的双重性,有广义与狭义之分。上文曾指出,广义上的“淮楚文化”是指先秦秦汉时期淮河流域因受楚国历史影响而形成的带有显著楚风特色的物质文化产物与精神文化成果,而狭义的“淮楚文化”则用来特定指称现今淮南地域范围内所存在的先秦秦汉时期因受楚国历史影响而形成的带有显著楚风特色的物质文化产物与精神文化成果。“淮楚文化”的概念若就广义与狭义的比较而言,前者可视为一种“泛指”的概念,广泛涉及到整个淮河流域境内楚文化的历史发展及遗存现象,现今河南、湖北、安徽、山东、江苏等五省都与这一概念存在紧密的历史关联,是“流域性”的楚文化概念的反映;后者则是着眼于楚文化在淮河流域的上游、中游、下游极为复杂的历史流变情况,又以古代“寿春”(即楚都“寿郢”)为核心的淮河中游地区为最重要的体现与代表,因此用来特别指称现今淮南地域的楚文化历史发展及遗存现象。如何更为准确地区别和界定“淮楚文化”的广、狭二义,对其“泛指”与“特指”的差异性、相通性做出更为合理的阐释,是学术文化界就“淮楚文化”概念逐渐形成学理性共识的关键所在,需要淮河流域五省楚文化研究者多方研讨、共同推进。当前“淮楚文化”的概念只是初步提出,尚在尝试性、探索性的界定过程中,其提出者、使用者、阐释者也以淮南市的楚文化研究者为主,仍未能获得国内楚文化研究者的广泛认同和接受。在现有基础上,充分利用“武王墩一

号墓”的发掘契机,着力推动“淮楚文化”的概念研究走深走实,使之真正成为中国楚文化研究的新创获、新领域、新亮点,是未来较长时期内淮南市楚文化研究者最重要的学术工作之一。

三是“淮楚文化”概念与“安徽楚文化”概念的联系与区别。“淮楚文化”概念的提出与安徽淮河流域密不可分。先秦时期,楚国后期政治重心转移至淮河流域中游的安徽地域,并在此走完最后的辉煌进程,彻底融入秦汉大一统政治发展的洪流之中。楚国在淮河流域长期经营,楚文化不断“东渐”于安徽北部的淮水之域,同时也深入到安徽中部的长江流域。虽然楚国后期政治发展是以皖北淮河流域为根据地,但皖中长江流域亦是楚国着重开拓与开发的地区,“随着楚人的东进,楚文化从汉水传播到淮水,从长江中游传播到长江下游”,“逐渐地吹遍江淮大地”^{[11]32}。从楚穆王时期灭六、灭蓼、征服群舒至楚庄王时期彻底攻灭反叛的舒蓼,兵锋直抵长江北岸,与吴、越相邻而角力,安徽长江流域深受楚文化的风气熏染,最终完成融入“楚文化圈”的历史进程。对现今安徽地域来说,楚文化的影响是广泛而深刻的,其包含着安徽淮河流域楚文化与安徽长江流域楚文化的两大历史构成,这正是安徽地域在中国楚文化发展史上的特殊性所在。湖北地域楚文化总体面貌反映为长江流域楚文化,与安徽地域相较,缺少了淮河流域楚文化的“异军突起”式体现,而安徽地域楚文化则既有淮河流域楚文化的厚重蕴涵,又有长江流域楚文化的重要展现,整体上反映为“江”“淮”楚文化的二重变奏,更能彰显出中国楚文化吞“江”纳“淮”、“江”“淮”一体的雄浑气魄与奇绝多彩。也因此,“安徽楚文化”这一概念实与“淮楚文化”既有重合之处,又有差异之别,不能混同而论。准确地说,“淮楚文化”概念属于“流域性”的历史文化概念,而“安徽楚文化”,则属于“区域性”的历史文化概念,前者具有后者所没有的“跨区域性”,需要从更为广阔的文化地理空间视角来衡量把握。广义的“淮楚文化”超出了“安徽楚文化”的范畴,但狭义的“淮楚文化”则是“安徽楚文化”的最为核心、最为厚重、最为精彩的历史构成。

淮南市是“楚国最后国都所在地”,更是“楚文化遗存的密集地”,“楚文化辉煌的重要展示地”,理应争取成为国内新的“楚文化研究的重要阵地”,越来越能“讲好安徽楚文化故事”,“展示好楚文化魅

力”^[16]。“楚文化”因“武王墩一号墓”的考古发掘而在国内外掀起新的热潮,这对淮南市楚文化研究者既是前所未有的学术契机,更是前所未有的学术挑战!如何更加准确地把握淮南地域楚文化的特质与特色,进而萃取提炼出充分显现雄浑奇彩之“楚风”的当代淮南城市精神^[17],这有待于楚文化研究者真正夯实“淮楚文化”概念的“第一块”学理基石。

四论“淮楚文化”

作为研讨淮河流域楚文化发展演变的学术概念,民国时期著名秦汉史学者劳榦就曾使用过,认为“长沙寿县等处的遗物所表现”的是“淮楚文化”,与“金村、濬县、郑县等处遗物所表现的周韩魏的中原文化”,“临淄的遗物所表现的齐文化”及“易县李峪遗物所表现的燕赵文化”都不同,而且“淮楚一带”经过长期的发展,“产生了轻巧而华丽的作风”,特别是“寿春”(即寿县)从战国时期以来“已经有不少的发展”,到汉代仍是“很著名”的几个“都市”之一^[18]。劳榦先生虽较早使用了“淮楚文化”一词来历史性地表述以“寿春”为中心的淮河流域楚文化的发展情况,但并未对其进行深入具体的学理分析和概念界定,这殊为遗憾。

二十世纪以来,江苏文化学者在论述和揭示淮河下游的淮安市与淮河文化、楚文化的关系时,时有对“淮楚文化”这一概念的使用,主要分为两种情况:一是侧重探讨淮河下游的“淮夷”及淮夷文化。如马超骏《淮楚文化的特质》一文以“活动中心在今淮安市一带”的被“讹称为‘徐’或‘楚’”的“以虎为图腾的部族”为重点考察对象,因而其所言“淮楚文化”实际上是以先秦时期“徐夷”和“徐国”为中心的,某种程度上,可与“淮徐文化”互换^[19]。二是侧重从淮安地域文化的视角出发,探讨“淮安文化”与淮河文化、楚文化的紧密关联。如胡健在《从“淮安文化”到“文化淮安”》中指出:“认为淮安文化是楚文化”乃是关于“淮安文化”讨论的代表性观点之一,持此种看法者还认为“淮楚”与“同为楚文化的湘楚(湖南)、荆楚(湖北)相区别”,具有“以水为依托,以义为价值,以(楚)歌为情韵”的特点^{[20][31]}。又如徐四海认为,淮安市“地处吴文化和楚汉文化交融的区域”,显著的文化特点之一便是“南北交融、兼容并蓄的淮楚文化特征”^[21]。此外,关于淮安历史文化的通俗性著作也时有提及“淮楚文化”,如《洪泽县文化志》^[22]

《中国·文化淮安》^[23]等。

江苏文化学者对“淮楚文化”概念的具体运用,既与劳榦先生一样,存在着概念界定不明的学理局限,也有因“淮安文化”复杂的地域性内涵而产生的争议性。这表现为:江苏文化学者一方面认同“淮楚文化”是淮安地域文化的历史特征之一,另一方面却又认为无法用“淮楚文化”简单概括与界定淮安历史文化的复杂蕴涵。因为,淮安历史文化虽与淮河文化、楚文化关系密切,但“淮安地处淮河下游”,历史演进中又深受运河文化、漕运文化、大湖文化(洪泽湖)的多重影响,故此“还难以归纳出它独有的文化特征”。以致于非但“淮楚文化”这一概念无法和“淮安文化”相等同,甚而连“淮安文化”这一概念的成立与否,“如果从学理上追究”,也“实在显得理由不充足了”^{[20][33]}。由此可见,江苏文化学者对“淮楚文化”与“淮安文化”的关系仍需进一步研讨厘清,对“淮楚文化”这一概念究竟如何界定与使用也有待于更深入的论述阐明。

与劳榦先生及江苏文化学者不同,当前安徽淮南文化学者对“淮楚文化”的概念展开了具体深入的学理探讨,并探索性地给予明确界定。淮南文化学者着眼于东周秦汉时期楚文化在淮河流域(尤以“寿春”为中心的“淮南”地域)的发展演变情况,提出“淮楚文化”概念的界定具有广义和狭义的双重内涵:“就广义来说,是指先秦秦汉时期淮河流域因受楚国历史影响而形成的带有显著楚风特色的物质文化产物与精神文化成果”,而“在狭义上可用来特定指称现今淮南地域范围内所存在的先秦秦汉时期因受楚国历史影响而形成的带有显著楚风特色的物质文化产物与精神文化成果”^[24]。淮南文化学者对“淮楚文化”概念的界定与使用,已初步摆脱了较为泛化的地域文化指称的局限,开始有针对性地系统研讨这一概念的学理依据、内涵、特点、影响及价值等重要问题,并不断结合楚文化在淮河流域、“淮南”地域的历史演变情况开展更为充分的讨论^[25]。

淮南文化学者对“淮楚文化”概念的反思界定,主要基于“淮南”地域在淮河流域及淮河流域楚文化发展史上的特殊地位与影响。与淮安市地处淮河下游不同,淮南市地处淮河中游,自古以来便是南北要冲、淮西咽喉。古代“淮南”地域的都会之地“寿春”,更是曾为晚楚“郢”城十八年、西汉淮南国都七十四年,是淮河流域最为重要的楚文化集聚地、传播地

与遗存地。在楚史专家张正明先生所论楚文化的五期(滥觞期、苗长期、鼎盛期、滞缓期和转化期)^[26]发展中,后两期与“淮南”地域关系甚大。某种意义上,“淮南”地域可说是楚文化历史命运的最后归宿之地。现今淮安市所在地域尽管也是淮河流域要地,但其在东周秦汉时期的历史地位远不及“淮南”地域。淮南市的前身“淮阴县”建县时间为公元前223年(秦王政二十四年),不论是建城史,还是在淮河流域的政治、经济与文化地位,都逊色于“寿春”。而且,现今淮安市所在地域在先秦时期纳入楚国版图之前长期为“徐夷”活动的区域,受“徐夷”文化影响颇深。徐夷所建“徐国”是淮夷中最大的诸侯国,公元前512年被吴王阖闾所灭。随着吴、越之地后尽归于楚国,徐国故地方才彻底成为楚国的一部分。因此,现今淮安市所在地域并非是淮河流域楚文化发展的核心区域,而只是受到楚文化较深影响的区域(主要在楚、徐两国相争时期以及徐国故地归楚之后)。从历史来看,广义上的“淮楚文化”当然包括现今淮安地域,但狭义上的“淮楚文化”则“淮南”地域更有代表性。“淮南”地域所拥有的“两座楚王墓、一座楚郢都”的厚重楚文化历史遗产,尤能证明此点。

比较现今淮安地域同淮南地域在淮河流域及淮河流域楚文化发展史上的差异之处,绝非为争抢“淮楚文化”概念的所谓“归属权”,而仅仅是为了揭示出这一概念研讨过程中存在的复杂性。通过对现今淮安地域、“淮南”地域的参照把握,能进一步深化我们对淮河流域楚文化的认识,也能为更准确地界定“淮楚文化”概念提供有益的帮助。毋庸置疑,现今淮安地域和“淮南”地域都是广义上“淮楚文化”的重要构成,在淮河流域楚文化发展史上也均有各自的特殊价值及影响。

“淮楚文化”概念的研讨,对淮南文化学者而言,起步要晚于江苏文化学者,但对这一概念更加科学准确的界定与阐释,却需要包括淮南文化学者、江苏文化学者在内的所有楚文化的研究者们共同努力。“淮楚文化”概念的提出、界定与阐释,从根本上看,反映出淮河流域在楚国演变史、楚文化发展史上所具有的不同于长江流域的特殊性和重要性。将这一概念的研讨作为重要“契机”,不仅能深化当前的楚国史、楚文化研究,且或能从新的学理视角出发,开拓“楚学”研究的又一具有广阔空间的新领域。

何为“淮楚文化”?这是一个充满学术兴味的

问题,也必将是一个常思常新的议题。

五论“淮楚文化”

“淮楚文化”概念的提出,与春秋战国时期楚国渐入淮河流域深度经营与发展的历史进程密不可分。但是,要深刻理解楚国同淮河流域的历史关系,却需着眼于楚国八百余年发展史的全局,具体而言,需从楚国和黄河流域、长江流域、淮河流域等三大流域的特殊关系来论。唯有如此,方能看清为何楚国发展的中后期会走向淮河流域,并最终以后者为归宿之地,也才能透彻理解“淮楚文化”得以成立的历史契机及内因所在。

“楚人出自黄帝(或以黄帝为先祖的部落集团)”,“直至夏时,楚之先祖仍为祝融,且始终居住在黄河中游”,楚族实乃“是发迹于中原地区的一个历史悠久的具有先进文明的部落集团”^[27]。直到西周初期,在熊丽、熊绎两位部族首领的率领下,楚族为避周人压迫,方向南迁徙,繁衍生息于荆山、汉水一带,从而离开黄河流域,彻底进入长江流域的广阔新天地。此后,楚族以江汉地区为立国重心,历代楚君竭力经略,在熊渠时期终逞其志,“甚得江汉间民和”,树立起“第一块震烁江汉的里程碑”^[28],成为长江流域迅速崛起的新兴强国。再至春秋前期楚武王熊通、楚文王熊贲父子之际,楚国灭“权”,克“州”、“蓼”,服“随”、“唐”,并“罗”、“卢戎”,北上中原地区,东抵淮河流域,真正奠定楚国称霸长江流域的政治根基,也掀开了楚人势力渐侵淮河流域的历史序幕。从此,楚国中后期四百余年的历史命运,同“江”、“淮”休戚与共,淮河流域亦成为楚国存在发展的根基之地。一部楚族兴衰史、楚国兴亡史,实是楚人走出黄河流域困境,南迁长江流域兴起,北返黄河流域受挫,东拓淮河流域谋存以至终结的发展史。

纵观楚族、楚国历史,楚人虽与黄河流域有着极为深厚悠久的发展渊源,但中原地区强族甚众,势力格局早已成型固化,无论是夏、商时期,抑或西周,楚人都无力从众强之手夺得一席之地。从季连至鬻熊,楚族早期发展十分艰辛,时有覆族之忧,甚而鬻熊之子熊丽率族南迁,也是为避周人之强的结果。尽管楚人被迫栖身蛮荒南国,与蛮族融合以求存身发展,长期同黄河流域无缘,可是在楚人心中还是有着极强的“黄河流域情结”,总是试图在自身势力发展较强之际,北上中原争霸,重返黄河流域,在楚庄

王熊倡“问鼎周室”中达到巅峰,将这一情结体现得淋漓尽致。楚庄王向早已衰落不堪的天下共主周天子发难,即是对“北方国家的挑战”,展现自己意图采取同周王室“分庭抗礼”,甚至“企图夺权”的政治姿态^[29],也是在某种程度上“弥补”楚族曾经失意于黄河流域、中原地区的历史缺憾,在华夏诸国面前找回楚族的政治尊严。富贵不还乡,犹锦衣夜行,用来揭示楚人对黄河流域具有的复杂历史情结和政治心态,比较贴合。可惜的是,终有周一代八百年,楚国都未能真正实现称霸中原的宏伟目标,兵进黄河流域,总是难以越过华夏诸国的集体屏障,终归难酬夙愿。总的来看,楚人是不得志于黄河流域的。

失之桑榆者,必得之于东隅。楚人在黄河流域无法实现的政治心愿及目标,却在长江流域和淮河流域获得空前的成功。楚国八百余年发展史,江淮流域是其上演轰轰烈烈、精彩纷呈的历史大戏的绝佳舞台。楚人在长江流域站稳脚跟后不久,即迅速向淮河流域挺进,东拓淮土以为己用。从楚文王熊贲始,至楚王负刍止,楚国全力经略淮河流域长达四百余年,将淮土彻底打造成继长江流域之后又一战略基地和大后方,实现了楚国声威赫赫、势震天下的辉煌发展。楚人凭借自身融入南蛮之地的历史经验,在征服淮河流域过程中,极善恩威并施、柔抚群夷,不断将众多的淮夷部族消融于“新楚人”之中。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里所言“南楚”和“东楚”之地,其主干即在淮河流域,与主要在长江流域的“西楚”不同,楚国更为广大的发展空间,正是随着两淮地区日益纳入其版图为实。以“芈姓”王族为核心的楚族,在同华夏诸族与蛮夷部族打交道的过程中,明显与后者有着更强的历史契合性,更有能力实现民族的碰撞交融、和辑为一。

楚族、楚国的历史发展,经历了从黄河流域到长江流域、淮河流域的复杂演进过程,谱写出精彩绝伦、气势恢宏的历史大剧,让后世印象至深。也是在此波澜壮阔的发展中,淮河流域对楚族、楚国的特殊重要性得以充分凸显。与黄河流域、长江流域相比,淮河流域对楚族、楚国存亡兴衰的重大影响,次于长江流域而优于黄河流域,在八百年楚国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因此,纵观楚人“辟在荆山”后“筚路蓝缕、跋山涉水”^[30]的艰辛发展历程,便可知淮河流域对其而言,是必然要有所期冀、志在开拓的生存空间,同长江流域一道共同建构起楚国

的核心政治版图。

但淮河毕竟不同于长江,而淮河流域亦不同于长江流域。淮河作为上古时期独流入海的巨河“四渎”之一,“居于黄河与长江之间,划出了中国东部的南北分界”,“在淮河两岸形成了南北过渡、承东接西、兼容并蓄的地域文化特色”,淮河流域在南北方文化交汇融合上“恰好起着关键作用”^[31],发挥出黄河流域、长江流域所不具有的独特作用。楚人高视雄步、势如破竹地迈进两淮地区,将众多淮夷方国纳入囊中,前所未有地让淮河流域整体化呈现出“楚风”色彩,实现了局部地区的政治统一和文化统一,这既壮大了楚国的发展力量,也无形中为“秦”灭“楚”后完成全国性的南北方“大一统”奠定了十分有利的基础。在某种意义上,楚人对淮河流域的征服经略,成为南北方文化大融合的关键推力,是天下归一的历史先声,昭示着中华文化必将走向“多元一体、天下一家”的时代大势。历史的重任落在秦国之前,已然先局部地落到了楚国身上。淮河流域的重要性随着楚国影响而彰显,在中国古代政治统一与文明革新发展上扮演了不可或缺、独具特点的历史角色。

正因淮河流域对楚族、楚国发展的此种特殊性、重要性,故用历史眼光来审视并提出“淮楚文化”概念便非可有可无的学术主张,而是具有必然的历史根由和深厚的文化基础。如若理性看待楚国八百余年发展史,恐怕无人会忽视黄河流域、长江流域与淮河流域所起作用的不同,也无人能抹杀淮河流域所产生的独特影响。当楚国政治发展重心在战国后期完全迁移至淮河流域时(城阳、陈郢、钜阳和寿郢四地俱曾为楚国政治中心所在地,城阳、钜阳的临时性较强),便注定淮河流域必将对楚国的存亡兴衰发挥出超越黄河流域,仅次于长江流域的重大作用。故此,提出具有广、狭二义内涵的“淮楚文化”概念^[24],用以揭示阐明楚文化发展在淮河流域的复杂演变情况,通过流域性的视角重新审思淮河流域不同于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对楚文化所产生的实际影响,便有其突出的学理价值和学术意义。

在现有多样化的“楚文化”概念里,“荆楚文化”和“淮楚文化”最能从整体上反映出楚文化同长江流域、淮河流域的特殊关系,其中所体现出的“流域性”视角是其他区域性、地域性楚文化概念所不具有的。着眼于大河文明的历史流变,用“淮楚文化”概念来

显现淮河流域对楚文化发展大不同于黄河流域、长江流域的特质,这将有助于人们深化对楚文化复杂性、多样性、博大性与融合性的认知,打破原有的固化思维,促进楚文化研究走向更为广阔的发展前景。

楚学研究的创新,总是离不开新的学术概念的探索尝试。新生事物的出现,尽管会有蹒跚曲折的过程,但其成熟发展的希望,同样蕴于其中。“淮楚文化”概念的提出、界定,能否在楚学、楚文化研究上留下独特的印记,历史将会作答!

六论“淮楚文化”

如何看待“淮楚文化”概念的提出,除去从正面展开研讨,亦可从反面来重新审思,即:如若没有这一概念的出现,是否能够继续用“荆楚文化”的传统概念来含括淮河流域的楚文化历史发展情况及其遗存?换言之,“淮楚文化”概念的提出是否有其无法缺失、无法否认的必要性?对此,或可从以下五个方面来探讨:

一是楚文化历史发展能否只论“江”而不言“淮”,用长江流域来遮蔽淮河流域的存在。从楚族自西周初年立国至被秦所灭,贯穿两周八百年历史的楚国发展历经了从长江流域崛起兴盛,到淮河流域渐趋衰落乃至消亡的全过程,其间楚国染指和经略淮河流域长达四百余年,这一时段占据了一半的楚国存在时间,可说是一部淮河流域楚政治、楚文化发展史,就是半部楚国史。由此来看,楚国历史是其长江流域发展史与淮河流域发展史的统一体,无“江”则楚国无由产生走强,而无“淮”则楚国难以达到“地方五千里,带甲百万”,雄踞江淮之间,号称“天下之强国”的政治巅峰,也难以在“鄢”“郢”失陷后凭借淮河流域为根基延续存在五十余年。是以淮河流域对楚国历史发展而言,绝非可有可无的存在,而是不可或缺、极其重要的前提条件。缺失了淮河流域的作用及影响,八百年楚国史必定被改写,甚而其能否存在“八百年”,也将是历史疑问。淮河流域在楚人那里,实际上是仅次于长江流域的“第二根基之地”,是其北上争霸、东向抗秦的大后方。楚顷襄王熊横迁都于淮河流域,是楚人长期重视和经略两淮地区的必然选择、必定结果,有其深层次的全局性的战略考量,并非慌乱决策下的轻率之举。楚“强”时,两淮地区是其进一步开拓进取的重要“后方”;楚“弱”时,则是其留给自己的一条重要“退路”。无论

兴衰,淮河流域都是楚国不容有失的战略根基之一,既与长江流域的作用影响有相似之处,又存在差异之别。审视八百年楚国史,如若只论“江”而不言“淮”,只重“江”而不重“淮”,用长江流域来遮蔽淮河流域的存在,恐怕并不符合客观的历史情况,也无法揭示出楚国历史发展真正的全貌。

二是淮河中游楚都“寿郢”(寿春)为中心的楚文化历史遗存的厚重存在,是否能被一般化对待,而不是突出强调其特殊性和重要性。在楚国中后期发展里,政治中心从长江中游迁移至淮河流域,特别是淮河中游,决定了“寿郢”(寿春)具有极为特殊的历史地位。八百年楚国史最后终结于“寿郢”(寿春),也让“寿郢”(寿春)成为楚国诸“郢”中与众不同之地。“寿郢”(寿春)承载着楚国最后的历史辉煌与荣光,是日暮之前的一抹亮丽晚霞。也因楚考烈王熊完和楚令尹春申君黄歇的用心经营,“寿郢”(寿春)拥有了十分厚重的楚文化历史遗存及底蕴,在先秦列国都城营建史上占据独特的一席之地。时至现代,以寿春城遗址、楚幽王熊悍墓、楚考烈王熊完墓、春申君黄歇墓为代表的楚文化历史遗存更是令世人惊叹,在楚文化考古发掘中影响深远。楚幽王熊悍墓、楚考烈王熊完墓是目前国内所发现的仅有的两座楚王墓,尤其是后者有幸得到了抢救性的科学考古发掘,被证实为迄今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结构最复杂的大型楚国王级墓葬,已提取包括青铜礼器、生活用器、漆木器、乐器、玉器、木俑等在内的编号文物一万余件,堪称有史以来楚文化考古发现的最重大成就之一。“两座楚王墓、一座楚郢都”(前者也可视为“两座楚王陵”),让古“寿郢”(寿春)所在的淮南市拥有了独一无二的楚文化历史遗产,形成了地域特色鲜明的楚文化传承发展优势。如此丰富厚重的楚文化历史遗存,也充分彰显出淮河中游在全国性楚文化体系内不容轻忽的重要地位。如何面向整个淮河流域楚文化的历史演变情况,客观认识以古“寿郢”(寿春)中心的淮河中游地区对全国楚文化产生的特殊影响,便成为学界需要重新有所深思研讨的重要议题。若无“淮楚文化”这一新概念的提出,人们是否能真正认识和把握到以古“寿郢”(寿春)为中心的淮河中游地区不同于以楚郢都(纪南城)为中心的长江中游地区的差异之处,是否能进而意识到淮河中游和长江中游同为楚国政治发展、文化发展之莫大肯綮的根本原由?

三是以往楚文化研究虽然在强调“荆楚文化”概念的同时,也先后出现了“湘楚文化”“巴楚文化”“吴楚文化”“陈楚文化”“蔡楚文化”“寿春楚文化”“江淮楚文化”“楚淮文化”“淮楚文化(淮徐文化)”等各种地域性楚文化概念,但是大都缺少严格的概念界定,而且少有真正能从淮河流域整体出发论及楚文化者。“湘楚文化”“巴楚文化”“吴楚文化”是湖南省、四川省、江苏省学者主要基于长江流域楚文化发展情况提出的概念,从不同的地域视角反映出长江流域上、中、下游楚文化的历史存在及影响。“陈楚文化”“蔡楚文化”“寿春楚文化”“江淮楚文化”“楚淮文化”“淮楚文化(淮徐文化)”等尽管是河南、安徽、江苏等地学者立足淮河流域提出的楚文化概念,但均缺少淮河流域的整体性视角,其中“陈楚文化”侧重于以古“陈郢”(陈县)为中心的淮河上游地区楚文化发展情况;“蔡楚文化”“寿春楚文化”“楚淮文化”则侧重于以古“寿郢”(寿春)为中心的淮河中游地区楚文化发展情况;“江淮楚文化”侧重于安徽楚文化发展情况;江苏学者使用“淮楚文化”这一概念往往等同于“淮徐文化”,侧重于淮河下游地区楚文化发展情况^[32]。以上概念虽多,却无法将淮河流域整体在楚文化历史发展里的独特性清晰揭示出来,也无法超越现有“蔡楚文化”“寿春楚文化”“江淮楚文化”“楚淮文化”“淮楚文化(淮徐文化)”等概念的种种局限,将以古“寿郢”(寿春)为中心的淮河中游地区对楚文化历史发展的特殊意义予以准确把握。因此,当前楚学界十分有必要全面系统地梳理各种楚文化概念,特别是对淮河流域楚文化概念集群需要深入辨析厘清,用“淮楚文化”的新概念来重新审视和界定淮河流域楚文化发展情况,形成一定的概念共识,以此推动淮河流域楚文化研究更好发展。在某种意义上,“淮楚文化”概念的提出、界定和使用,是对现有楚文化概念体系深入反思的学术产物,是试图改变学术概念上对淮河流域楚文化发展情况总体认识不清、定位不准的现有局限的理论结果。若无对“淮楚文化”概念的审思界定,楚学界对淮河流域楚文化整体发展情况的认知仍难以形成学术自觉和理论自觉,其结果必然是依旧弱化了淮河流域楚文化发展在全国性楚文化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及意义。

四是楚文化研究在突出强调长江流域“荆楚文化”的同时,需不需要用淮河流域“淮楚文化”作为重

要的参照对象。“淮楚文化”不同于长江流域意义上的“湘楚文化”“巴楚文化”和“吴楚文化”,这一概念对“荆楚文化”具有独特的参照意义。楚国八百余年发展史从长江流域走向淮河流域、兴盛于长江流域而终结于淮河流域,对长江流域楚文化发展情况的学术研究,如有淮河流域楚文化作为比较对象,当能得到更为深化的认知,亦可开拓出长江流域楚文化、淮河流域楚文化比较研究的新领域,在互动研讨中实现双向受益。因此,改变以往楚学研究里,代表长江流域的“荆楚文化”独大发展的局面,或许对楚文化的多元化研究能产生有益的促进作用,更能显现出楚文化博大精深、丰富多彩的历史内涵。

五是现有楚文化的区域性、地域性研究视角及方法尚存在一定的不足,无法从长江流域、淮河流域的整体出发来探讨楚文化的历史演变情况,因此也需要提出新的“流域性”的视角及方法,进一步深化楚文化的研究内涵。楚文化的兴衰存亡同长江、淮河所代表的大河文明密不可分,长江流域、淮河流域虽皆有上、中、下游之分,受楚文化影响也有所不同,但同为一条大河、一个流域,其必有共同的内在规律发挥作用,从流域整体着眼,自有不同于区域性、地域性研究视角的新观点新创获。

从以上五方面反观“淮楚文化”概念的提出,我们或能清楚认识到,这一概念的存在与否对楚文化研究并非可有可无之事,而是确有其提出的客观性、必要性与合理性。须知,淮河流域同长江流域一样,是楚国历史兴亡、楚文化演变发展的根基之地,缺少了对淮河流域楚文化的真正重视,“半部”楚国史就缺失了!

七论“淮楚文化”

2016年1月,寿县从六安市正式划归淮南市,淮南市成为安徽省内楚文化历史遗存最为丰厚的城市。2020年以来,“武王墩一号墓”考古发掘工作以其突破性的重大收获,再一次证明了寿县划归后的淮南市在楚文化历史遗存上拥有自身极为显著的独特优势——“两座楚王墓、一座楚郢都”(即楚幽王熊悍墓、楚考烈王熊完墓、寿春城遗址),非其他安徽省内城市可比。也由此,淮南市学术文化界重新审视楚文化在淮南市域内的历史演变情况,适时提出了“淮楚文化”的概念,试图从寿县划归后的“新淮南市”的全局着眼,对淮南地域在楚文化历史发展

上的特殊地位、影响及价值有新的自我定位,并进而找到淮南地域楚文化在全国性楚文化体系内的合理位置,为淮南市传承创新、发掘利用楚文化历史资源,打造“楚风汉韵”的城市文化形象奠定更为坚实的基础。

在“淮楚文化”概念出现之前,无论是淮南市,还是尚未正式划归淮南市的寿县,都曾结合自身楚文化历史遗存的特定情况,提出相应的地域性的楚文化概念,如“蔡楚文化”“楚风汉韵”“楚汉文化”“楚淮文化”“寿春楚文化”等,均在一定范围内产生了影响,在淮南市及寿县也各有一定的认同度。但随着“淮楚文化”概念的提出,以上曾发挥影响的地域性楚文化概念亟须重新有所审思研讨,以辨明其同“淮楚文化”这一新概念之间的具体关系,为淮南市准确界定和使用“淮楚文化”的新概念来反映自身整体性的楚文化历史遗存特色提供重要的学理前提,避免多样化的地域性楚文化概念在使用上的随意性、混乱性的弊端。

先说“蔡楚文化”的概念。春秋战国时期,蔡、楚两国先后在淮南地域建都立国。公元前493年,蔡昭侯姬申为避楚昭王熊珍攻伐,在吴国翼护下迁都州来(史称“下蔡”,现代考古证明地望在今寿县一带)。此后蔡成侯姬朔、蔡声侯姬产、蔡元侯、蔡侯齐继续在下蔡维持蔡国的存续,直至公元前447年终为楚国所灭。蔡国在今天淮南地域一共存在了46年。在先秦州来国后,对淮南地域文化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的周代诸侯国,首推蔡国。半个多世纪的政治经营,蔡国“留下了大量文化遗存,与此后的楚文化成为淮南文化的源头”^[33]。新中国成立后,1955年在寿县西门内因修建水利工程发现蔡侯墓,学界一般认为即是蔡昭侯姬申墓;1958年、1959年又在淮南市蔡家岗发现两座蔡墓(当地俗称赵家孤堆),因其中编为二号墓的北孤堆出土有错金铭文“蔡侯产”剑三把,故有学者认为此墓为蔡声侯姬产墓,而编为一号墓者则为蔡元侯墓^[34]。楚灭蔡后,在蔡国基础上进一步着力经营淮南地域,随着楚国在楚、吴、越三国角逐里的彻底胜出,最终以寿春(今寿县)为中心的淮南地域逐步被打造成为楚国的根基之地、战略后方、复兴之处。从楚考烈王熊完迁都寿春,至楚王负刍败亡,楚国立都淮南地域19年。蔡、楚两国合而论之,在淮南地域的立都时长共达64年。基于蔡、楚两国与淮南地域的紧密关联,以往淮南

市学术文化界惯将“蔡楚”并提,时以“蔡楚故地”“蔡楚遗珍”“蔡楚文化”“蔡楚文明”来指称先秦蔡、楚两国在淮南地域内的历史文化遗存及影响,如淮南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淮南市志》^[35]《淮南市志(1978~2005)》^[36]《走进淮南(2013)》^[37]、姚尚书编著《淮南历史漫步》^[38]。“蔡楚文化”作为淮南市的历史文化底蕴及特色,在安徽省内外也得到一定的认同,如《走进安徽》编委会编《走进安徽(2010版)》^[39]、冯少茄等著《资源型城市发展生态旅游探索——以淮南市为例》^[40]。

再说“楚风汉韵”与“楚汉文化”两个概念。这两个关涉楚文化的概念在近些年淮南市文化形象塑造及文化宣传中也多有使用,特别是“楚风汉韵”,在安徽省内外有较大影响。“能源之都、楚风汉韵”是当前较为常见的对淮南城市形象与特色的凝练概括,如淮南市地方志办公室编《淮南概览2009年版》^[41]、中共淮南市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编著《淮南概览》^[42]、《读懂淮南》编写组编《读懂淮南》^[43]、《安徽年鉴》编辑委员会编纂《安徽年鉴》^[44]、《安徽优秀传统文化丛书》编写组编《皖北文化九讲》^[45]等。“楚汉文化”的概念在淮南市文旅经济转型发展中提到较多,但主要体现在政府相关部门对整合淮南市楚文化、汉文化资源,实现文旅融合发展的文件报告里,淮南市学术文化界使用较少。“楚风汉韵”与“楚汉文化”是十分相近的两个概念,相较而言,淮南市内外各界人士对“楚风汉韵”的认同度、接受度较高,时有提及。

接着说“楚淮文化”的概念。“楚淮文化”这一概念主要由安徽学者提出,用以研讨中国道家哲学思想与淮河流域的历史关系,如李霞著《论楚淮文化对道家生命哲学形成的影响》^[46]、高旭著《大道鸿烈——〈淮南子〉汉代黄老新“道治”思想研究》^{[8]184-197}、董晓红著《庄子生命哲学的酿生及其社会效应》^[47]等。其中高旭从探讨《淮南子》成书的淮河地域背景着眼,对“楚淮文化”概念有所辨析界定,认为李霞教授所言“楚淮文化”是“着重从淮河流域楚文化与东夷文化融合视角出发,对先秦道家文化的形成背景”所作的揭示,属于广义上的范畴,同时提出狭义上的“楚淮文化”乃“特指西汉刘安时期淮南国独特的地域文化背景”^{[8]194}。此后,由于高旭在安徽理工大学先后推动建立校级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机构“楚淮文化研究所”(2013年5月20日)、“楚淮文化研究中心”

(2015年4月10日),并逐步开展以《淮南子》研究为中心的学术活动,促使“楚淮文化”概念在淮南市内外产生一定的影响。但总体来说,“楚淮文化”概念主要由安徽省内从事道家哲学思想研究的学者使用,其学术性远大于社会性。

最后说“寿春楚文化”的概念。在寿县从六安市正式划归淮南市之前,筹建于1958年10月的寿县博物馆曾称作“寿春楚文化博物馆”,是安徽省建馆最早的博物馆之一,以侧重收藏楚文化体系文物为突出特色^[48]。寿县是历史上著名的楚“郢”名都,也是楚文化历史遗存的厚集之地。因此,六安市、寿县学术文化界惯常使用“寿春楚文化”这一概念,代表者如陈得时著《寿春楚文化》,书中对“寿春楚文化”作了基本的解释和界定,认为:寿春作为楚的都城,“再加上楚的八百年的国史,为今天的寿县乃至江淮地区,造就成拥有大量楚文化遗存的胜地。这一部分的楚文化,我们姑且把她称之为寿春楚文化”^[58]。“寿春楚文化”的概念也得到其他一些学者的认同使用,如钱坤著《古寿州考略》^[49]、丁继龙著《试论寿春楚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影响》^[50]、刘睿编著《考古安徽》^[51]等。“寿春楚文化”这一概念在寿县有着较为深厚的学术文化基础和群众基础,承载着寿县人民对楚文化深沉的历史情感。

综括以上情况,可知寿县正式划归前后,无论是淮南市,还是寿县,都曾提出过关于淮南地域楚文化的相关概念,尤以淮南市学术文化界提出者为多,包括“蔡楚文化”“楚风汉韵”“楚汉文化”“楚淮文化”等四个概念。除“楚淮文化”和“寿春楚文化”的概念,有学者曾给予较为明确的界定外,其他概念均在一般化的历史经验层面上使用,缺少深入的学理剖析和定义。这也反映出过去淮南市、寿县对楚文化的历史认知及市、县文化定位,缺乏足够的理论性、明确性,导致概念在多样化的提出、使用中存在着模糊性、同质性、随意性的弊病。因此,以2016年1月寿县正式划归淮南和始自2020年的“武王墩一号墓”考古发掘为新的契机,淮南市实有必要全面回顾、梳理和厘清已有的各种楚文化概念,在此基础上从“新淮南市”的全局出发,探索使用“淮楚文化”的概念来重新审视定位自身所拥有的极为丰厚的楚文化遗存,克服以往各种概念存在的全面性、系统性、理论性不足的缺点,真正反映出淮南市整体楚文化历史遗存的全貌来,更好地彰显其与众不同的鲜明的

淮河流域特色、淮南地域特色。在此意义上,“淮楚文化”这一核心概念的学理反思对当前及以后淮南市楚文化的良好发展而言,实有“牵一发而动全局”的关键意义!

八论“淮楚文化”

在传统楚文化研究中,区域性视角的体现比较突出。有学者曾指出:“楚文化主要发现于现在的湖北、湖南、河南、安徽等省,因此有的研究者又以上述几个省为中心,人为将楚文化划分成某某省的楚文化。其实这种分法是不严谨的,因为当时的楚文化并不按现在的行政区划来划分成几个地方类型的文化”,但由于现实因素的制约,“有的研究工作也是站在各自的立场和角度来考虑的,以省为区域来研究某一个大的课题,常常是作为一些基础研究的有效方法”^[52],可见楚文化研究的区域性视角及方法实际上存在利、弊皆有的两面性,并不适合作为唯一的研究视角及方法来运用,而是需要同其他新的视角及方法兼而用之,互扬其长,互补各失,方能取得更为切实而理想的研究成果。“淮楚文化”概念的提出,不仅仅关乎楚文化研究的概念革新,更涉及到楚文化研究的新视角、新方法的探索创新,因为它所反映出的是一种不同于以往区域性的“流域性”的视角及方法,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传统范式与做法的不足,为楚文化研究的深化发展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作为流域性视角及方法的体现,“淮楚文化”概念的提出对传统区域性视角及方法具有的“突破性”意义主要含括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突破了以往以现代行政区划人为划定楚文化区域的研究理念。如果说传统楚文化研究立足于现代行政区划来展开工作,有其不得不然的现实缘由,那么,从流域性视角出发来重新审视楚文化的历史演变进程,则能避免这种现代性研究方式的天然局限。确如上述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当时的楚文化并不按现在的行政区域来划分或分成几个地方类型的文化”^[52],“古”“今”行政建置不同,区划有别,无法简单相等,但以长江流域、淮河流域而论,“古”“今”流域却具有显而易见的历史延续性和不变性,因而从流域性视角着眼,对楚文化展开新的学术审视和系统研讨,便具有区域性视角所无的独特优势。在某种意义上,这种流域性的视角及方法反倒能更

加贴近楚文化演变的历史实际,更有助于研究者回到特定的时代情势之中去体认、揭示和把握楚文化迁变流衍的客观规律与基本特点。与此相应,研究视角及方法的创新变化,让楚文化的研究内涵也能得到更进一步的深化丰富,甚而催生出新的研究领域来。

二是突破了以往局限于区域性比较的研究方法。以往楚文化研究中,基于区域性的视角,惯于将湖北、湖南、河南、安徽、四川、江苏等省楚文化发展情况进行比较,此种方法对楚文化研究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在一定程度上突显出各省楚文化演进流变的不同特点,丰富了学界对楚文化发展的区域多样性、复杂性的认知,避免仅局限于对湖北省为主的“荆楚文化”展开研讨。也因之,湖南省学者提出了“湘楚文化”的概念,四川省学者提出了“巴楚文化”的概念,河南省学者提出了“陈楚文化”的概念,江苏省学者提出了“吴楚文化”的概念,安徽省学者则提出了“寿春楚文化”“蔡楚文化”的概念,这些多样化的楚文化概念如若探究其实质而言,皆是区域性楚文化内涵的具体体现,反映出各省学者都试图结合本省楚文化历史演变的情况,有针对性地深入把握各自省域内楚文化所具有的发展规律及基本特点。以上各省学者对本省楚文化的研究,往往会同其他省份有所比较,尤其是和湖北省的“荆楚文化”相论衡评议。但不可否认,现有的基于区域性楚文化视角的比较研究,亦存在局限。提出流域性的研究视角及方法,有助于打破传统研究方法的定式思维和学术藩篱,促动产生新的研究路径。一方面,可着眼“全流域”展开上游、中游、下游不同地域的比较研究,如楚文化在淮河流域的上游、中游、下游的历史表现及影响既有共同之处,又有差异之别,而以往的研究对淮河流域的共同特征和上游、中游、下游的内在区别并没有很好的辨析探讨,笼统而说、大而化之的论述较多,深细精当的阐发较少。另一方面,也可从流域比较的视角出发,对楚文化在黄河流域、长江流域、淮河流域等三大流域的演进历程进行研究,形成对楚文化发展所具嬗变性、复杂性、多样性、博大性的新认知。建立在楚文化流域性发展理念基础上的新的比较研究,如用历史眼光来审视,显然有着传统的区域性比较方法所不具备的特点及优势,颇值得重视和探索。

三是突破了传统“楚文化”或“荆楚文化”偏重

于长江流域的认识局限。尽管“荆楚文化”的提法由来已久,是古今学者对楚文化的一般化称谓,可是在现实中,无论学界,抑或民间,都惯常把“楚文化”或“荆楚文化”主要视为“湖北楚文化”,甚至简单地等同为一,进而将其看作是长江流域楚文化的完全的历史体现。近年出版的六卷本《荆楚文化史》中明确言道该书的空间范围“是以今湖北行政区划为主”,“研究的空间范围原则上不超出当今湖北行政区划”,只是在“牵涉到湖北局势发展的重要事象时,有关叙述或分析会超出今湖北省界的范围”^[53]。该书的撰写汇聚了当前国内楚学界的众多资深专家,他们对“荆楚文化”的认识实具代表性,从中可看出“楚文化”或“荆楚文化”易于等同于“湖北楚文化”的传统看法确为深入人心。学贵新识,“淮楚文化”概念的提出,是对这种传统看法的一次尝试性的突破,意图引起学界对“荆楚文化”所体现出的区域性定位及内涵有所反思,促使人们逐渐改变将“楚文化”或“荆楚文化”简化等同于“湖北楚文化”的“旧识”,从而形成流域性楚文化实际存在多样性的“新识”。严格意义上的“楚文化”理应包括黄河流域楚文化、长江流域楚文化、淮河流域楚文化等三大构成,而又以后两者为著,故此“淮楚文化”概念的提出,是对“楚文化”或“荆楚文化”的传统认知的一种质疑、挑战和突破。

以上三个方面的“突破”,是“淮楚文化”概念提出的重要价值及意义所在。对“淮楚文化”的认识把握,不能只是就“概念”本身来论“概念”,而是需要更深刻地看到这一概念所内含的楚文化研究视角及方法的变化,恐怕这是比概念本身更为重要、更值得人们认真省思的地方。楚文化研究的进展,既要随着新的考古发现而有所变化,也应同原有研究视角及方法的革新而变化,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再往深了说,“淮楚文化”概念所体现出的流域性视角及方法的背后,实则反映了我们对楚文化研究理念与“范式”的新审思、新探索。如何让楚文化研究减少受现今行政区划认识的影响,最大程度上回归历史,贴近楚文化发展的实际情势,更准确地揭示出楚文化演进流变的内涵、特点与规律来,学者们或可从“淮楚文化”这一新概念上获得一些有益的学理启发。

总括来说,用“淮楚文化”的概念来带动楚文化研究视角及方法的革新,以流域性视角的探索实践

来克服传统的区域性研究的局限,这非但不会有损楚文化研究的良好发展,反而能够“刺激”现有楚文化研究走向新的学术尝试,为楚文化研究发展提供区域性视角之外的一面新的“镜子”。用流域性视角反思区域性视角的不足,同时用区域性视角观照流域性视角的得失,于楚文化研究而言,是相互启发、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相得益彰的学术探索,这让楚文化的研究视角及方法更能表现出积极的多元化意蕴,乃至学术范式上也有可能促成有益的革新变化。采用区域性、流域性的双重视角研究楚文化,谨慎对待古、今政治情势的差异性,既能最大程度上回归历史实际来论“楚文化”,亦能更有力地揭示出楚文化在现代国家与社会发展中仍然具有的非同一般的价值和影响。就此而言,“淮楚文化”的新概念,具有潜在丰沛的学术活力,其对楚文化深化研究所能起到的促动作用,将会随着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重视和使用,日益显现出来。长远来看,“淮楚文化”研究,可谓是前景广阔,未来可期!

九论“淮楚文化”

“淮楚文化”概念的提出,乃是基于两方面的动因:一是从“流域性”视角出发,重新审视淮河流域楚文化的历史演变进程及历史遗存状况;二是着眼淮河流域楚文化的多样化的地域发展,重新审视现今淮南市在其中所具有的独特地位及影响,对淮南地域楚文化历史遗存进行新的全面认知和把握。就淮南市来说,用“淮楚文化”概念来实现自身在淮河流域乃至全国性楚文化发展中的重新定位,无论是对其学术文化界的楚学研讨,还是对其现实的经济社会转型与城市文化建设而言,都具有不容忽视的促进作用。

但是,也必须看到,淮南市在楚文化发展中的这种自我定位,需要结合淮河流域楚文化历史演变的具体情况来审思,换言之,需要从整体流域发展和多样化地域发展的双重视角来探讨。

就整体流域发展而论,淮南市学术文化界提出的“淮楚文化”概念的广义即是指“先秦秦汉时期淮河流域因受楚国历史影响而形成的带有显著楚风特色的物质文化产物与精神文化成果”^[24]。淮南市位于安徽省中北部,地处淮河中下游咽喉要地,是战国晚期楚国的王都京畿所在之地,楚文化历史遗存极为丰富厚重,乃淮河流域楚文化发展的核心构成之一。

从2020年“武王墩一号墓”抢救性考古发掘以来,淮南市学术文化界开始重新反思淮南地域在淮河流域楚文化与全国性楚文化发展中的定位问题,尤为注重研讨淮南地域同淮河流域楚文化的特殊关系,试图放眼淮河流域的整体,对淮南市楚文化历史演变及遗存情况予以新的系统梳理,为淮南市传承创新、活化利用楚文化历史遗产奠定坚实的学理基础。因此,“淮楚文化”概念的提出始终同楚文化在淮河流域的整体性历史发展密不可分,是从“流域性”视角出发,不同于传统“区域性”视角的新思考新探索,也是对淮南市楚文化历史遗存所体现出的至为显著的淮河流域风貌及特色的理论反映。

就多样化地域发展而论,淮河流域干流贯穿河南、安徽、江苏三省,形成了以三省为基本流域范围的上游、中游、下游,相应地,楚文化历史演变在淮河流域也表现为上游地域楚文化、中游地域楚文化、下游地域楚文化三种形态。因此,淮河流域楚文化发展既有整体化的全流域特点,也存在着上游、中游、下游的不同之处,需要具体认识和把握。以河南省周口市淮阳区(旧为“淮阳县”)所代表的“陈楚文化”是淮河上游楚文化的集中体现。淮阳区古为“陈国”故地,地处豫东要冲,历史极为悠久,曾是先秦时期的中原大国之一,但后为楚国三度所灭(楚庄王熊侣时期、楚灵王熊虔时期、楚惠王熊章时期),终成为楚国北方的军事重镇。公元前278年,楚顷襄王熊横兵败强秦,被迫迁都至“陈”,由此晚楚立都于“陈”达38年。从楚国灭陈至楚亡,“陈”为楚国占据时长200多年,其楚化程度甚深,是楚人在淮河流域最早着力经营的根据地。由于陈国自身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故“陈楚文化”实则为陈文化同楚文化深度交融后的产物,楚风之内潜隐陈韵。以安徽省淮南市为代表的“淮楚文化”则展现出淮河中游楚文化的精神风貌。公元前241年,楚考烈王熊完正式迁都于“寿春”(今淮南市寿县),直至公元前223年楚王负刍为秦所灭,晚楚立都于淮南市达19年。在楚国彻底兼并淮南地域之前,此地曾为古州来国故地,亦曾是蔡国晚期立都之所(公元前492年—公元前447年),历经蔡昭侯姬申、蔡成侯姬朔、蔡声侯姬产、蔡元侯、蔡侯齐等五世五侯,因而“淮楚文化”内聚了淮夷文化、蔡文化、楚文化的核心要素,还浸染有一些吴文化、越文化的气息(“州来”曾为楚、吴、越三国的角逐之地,尤其是楚、吴两国在

此地曾拉锯争夺80余年)。受现代行政区划迁变的影响,2016年1月寿县划归淮南市前,惯言“寿春楚文化”,而淮南市则多提“蔡楚文化”。当前从淮南市楚文化历史资源整合发展的新情势出发,淮南市学术文化界提出“淮楚文化”的概念来反映淮河中游淮南地域楚文化历史演变及遗存的基本情况。以江苏省淮安市为代表的“淮徐文化”(淮安市学术文化界也称为“淮楚文化”)是楚文化在淮河下游的重要反映。现今淮南市境为古淮夷、徐夷的主要聚集地 and 政治、经济活动中心。古“徐国”曾在淮河下游存在长达千余年,是东夷部族中文明程度较高者之一。公元前512年,徐国被吴王夫差派遣孙武、伍子胥所灭。随着吴国后亡于越国,而越国又为楚威王熊商所并,徐国故地尽入楚人彀中。“淮徐文化”中徐夷文化、吴文化、越文化与楚文化交织在一起,也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淮域楚风。但相比淮河上游的“陈楚文化”、淮河中游的“淮楚文化”而言,“淮徐文化”的楚风内蕴稍显不足,这乃因淮河下游地区在历史上并未成为楚国政治经济中心之地的缘故。由上可知,楚文化在淮河流域的演变发展存在多样化的形态,上游、中游、下游的情况各有其特点,无法简单一概而论,需要具体分析探讨。

综括来说,楚文化对淮河流域有着全流域性的历史影响,无论上游、中游、下游,从广义而言,都可称之为“淮楚文化”,以此彰显出淮河流域楚文化发展不同于长江流域楚文化的特殊之处。但从狭义而论,淮河流域楚文化发展却客观存在着上游、中游、下游的多样化形态,又无法简单用“淮楚文化”这一概念来统一表述。不同地域的楚文化概念的产生,有着自身独特的历史情况,淮河上游地域、淮河中游地域、淮河下游地域亦是如此。一方面,我们需尊重这种楚文化概念产生的历史性、地域性和多样性,另一方面,也应着眼当代楚文化发展的现实需求,探索更适宜于淮河流域上游、中游、下游不同地域的楚文化发展的新的概念表达,使之更能反映出各地域楚文化历史演变及遗存的实际情况,也更有利于开展各地域楚文化的学术研究。如淮河下游的淮安市、淮河中游的淮南市,先后都提出和使用“淮楚文化”的概念,但实际上,二者对“淮楚文化”狭义上的理解大不相同。淮安市学术文化界所言“淮楚文化”主要体现的是“徐楚”(即徐夷文化与楚文化的融合)的内涵,淮南市学术文化界则重在反映“蔡楚”(即蔡文化与楚文化的融合)的内涵。淮南市学术文化界基于2016年1月寿县正式划归淮南市,淮南市楚文化历史资源获得前所未有的整合契机,故立足行政区划调整后的“新淮南市”从狭义上对“淮楚文化”进行明确界定,认为其“指称现今淮南地域范围内所存在的先秦秦汉时期因受楚国历史影响而形成的带有显著楚风特色的物质文化产物与精神文化成果”^[24],此“淮南地域”即指现今寿县在内的淮南市全境而言。因此,对淮南市来说,“淮楚文化”概念的广义与狭义是较为明晰的。与之不同,淮安市学术文化界甚至江苏学术文化界,尽管在各种著作里多又提及“淮楚文化”者,但始终缺少明确的概念界定,对“淮楚文化”与“淮徐文化”的概念联系及区别也存在犹疑模糊之处^[32]。这反映出对淮河流域不同地域楚文化概念的研讨,仍需进一步深入开展,也仍有待于形成学术共识。在以往的楚学研究中,对淮河流域楚文化的重视远不及长江流域楚文化,而对淮河流域楚文化发展的多样化情况及淮河流域楚文化概念的多样性的探讨,更是不足,这种研究的局限性需要楚学界不断予以克服。楚文化既是博大精深、丰富多彩的,同样是充满复杂性的,对“淮楚文化”概念的探索,在一定程度上便反映出了楚文化所具有的“复杂性”。

十论“淮楚文化”

立足区域文化、地域文化的视角来看,“淮楚文化”同“安徽文化”及“淮南文化”的关系,也是饶有兴味,值得深思的议题。

先说“淮楚文化”和“淮南文化”的关系。作为地域文化,“淮南文化”对淮南地域而言,是一个总体性的概念,包括古今以来淮南地域发展中形成的诸种具有显著地方特色的文化形态。狭义上的“淮楚文化”作为淮南楚文化的集中体现^[24],自然是“淮南文化”的重要构成之一。除“淮楚文化”外,古今淮南地域发展中还形成了淮河文化、淮夷文化、汉文化、淮南子文化、八公山文化、豆腐文化、二十四节气文化、寿春(寿州)古城文化、战争文化、寿州窑文化、紫金石文化、近现代煤矿文化、新四军红色文化、淮南历史名人文化、淮河流域(淮南)民俗文化等丰富多样的文化形态。但毫无疑问,“淮楚文化”是这些淮南地域文化形态里最具历史特色及影响的代表者之一。

战国晚楚时期和西汉淮南国时期,是淮南地域文化发展史上的“黄金时代”。以“寿春”为中心,淮南地域先后迎来了“楚风”“汉韵”的文化淬炼和精神洗礼,收获了楚文化、汉文化的极为丰富的历史成果,也为后世遗留下了至为丰厚的历史遗产。两座楚王墓(楚幽王熊悍墓、楚考烈王熊完墓),一座楚郢都(寿春城遗址),一个泽被后人的“天下第一塘”——芍陂,让“淮楚文化”既成为中国楚文化最富地域特色的历史构成之一,也成为淮南地域文化发展史上最辉煌的历史成就之一。两汉以后,淮河两岸战乱频仍,时有南北割据力量对峙拉锯,淮南地域再难出现如战国晚楚时期和西汉淮南国时期那样的文化鼎盛景象。直至新中国成立之后,淮南地域方才迎来了新的文化复兴,朝气蓬勃,日趋繁荣。纵观历史,将“淮楚文化”视为古今淮南地域文化发展中最具特色及影响的代表者之一,实为名副其实,堪称允当。或可打个通俗的比方,“淮楚文化”能被看作是“淮南文化”的“龙头”,这个“龙头”让当代淮南城市发展拥有了沿淮其他城市所无的独特文化气质与灵韵。

再说“淮楚文化”与“安徽文化”的关系。安徽省地处我国东南部,长江、淮河横贯其中,将全省分为淮北(或皖北)、江淮(或皖中)、江南(或皖南)三大自然区^[54],古今历史演变中安徽区域形成了博大丰富、异彩纷呈的文化内涵。当代“安徽文化”尤以皖北的淮河文化、皖中的皖江文化、皖南的徽文化而著称。受2020年来淮南市“武王墩一号墓”的抢救性发掘的强烈促动,以淮南市为中心的淮河流域中游楚文化的研究得到高度关注,皖北淮河文化出现了新的可喜变化、新的文化亮点。“淮楚文化”概念的提出,便是对此突出的反映。有学者指出安徽省是“楚国最后国都所在地”,也是“楚文化遗存的密集地”,“楚文化辉煌的重要展示地”,“楚文化研究的重要阵地”,因此素有“吴头楚尾”之称的安徽省与楚文化有着不解之缘,而“丰富的楚文化遗产资源是安徽的一张金名片”^[16],甚至可说是“南有徽文化,北有楚文化”。长期以来,皖北楚文化的历史存在感较弱,即使在淮河文化里,也未曾得到充分的重视,更遑论在“安徽文化”中获得应有的地位认定。这种不足随着淮南地域楚文化考古的重大发现,随着“淮楚文化”概念的提出,正在日益被克服。越来越多的学术文化工作者以及社会大众,开始认识到楚文化在“安徽文化”中的特殊性和重要性,开始为安徽楚

文化摇旗呐喊、振臂高呼。淮南市学术文化界正是适应这一新形势的发展需要,明确提出并探索性阐释“淮楚文化”的新概念,力图着眼中国楚文化、安徽楚文化的全局,重新定位淮南楚文化,为有力推动淮南楚文化的良好发展,更好形塑淮南城市文化形象提供重要条件,也为淮南城市文旅经济转型发展创造新的历史契机。深入发掘淮南地域楚文化资源,传承创新楚文化历史遗产,这必将充实“安徽文化”的历史内涵,展现出“安徽文化”所具有的显著的楚文化特色,让“安徽文化”的博大丰富更能得到世人的由衷认同和赞赏。

最后说“淮楚文化”对“淮南文化”同“安徽文化”所起到的积极的贯通融合作用。“淮南文化”如要在“安徽文化”中占据不可或缺、不容忽视的一席之地,就必须充分显现出自身的特色内涵来。用“淮楚文化”来反映淮南历史文化的鲜明特色,凭借极为丰厚的楚文化历史遗产为“安徽文化”繁荣发展更好助力,这是当前淮南市最为可贵、最需珍惜的文化机遇。打好楚文化牌,传承创新、活化利用楚文化历史资源,既是促进安徽文旅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有效途径之一,也是推动淮南城市经济社会转型的重要突破口之一。因而,无论是对淮南市,还是安徽省,楚文化历史遗产都是一笔宝贵的文化财富,是实现二者有机融合发展的重要贯通点和结合点。换言之,“淮楚文化”不仅让淮南楚文化在中国楚文化发展拥有一席之地,而且让“淮南文化”在“安徽文化”发展、安徽经济发展中更能出彩,更能显示出自身的独特价值。

综上所述,对“淮楚文化”概念的审思,紧密结合“淮南文化”和“安徽文化”来进行,我们可以产生新的认知,能够对“淮楚文化”的定位问题有更为准确的把握。历史而客观地阐释“淮楚文化”概念,是与淮南城市发展命运息息相关的重要课题,只有从不同视角来多方研讨,才能逐步揭示出这一楚文化的新生的核心概念所具有的丰富意涵,才能真正促进淮南楚文化、安徽楚文化的更好发展,丰富中国楚文化的学术内涵。就此而言,“淮楚文化”概念的研究阐释工作,任重道远,还需更多的学术文化工作者参与,也仍有待于学术文化界共识的逐渐形成。但无论如何,“淮楚文化”概念的产生,意味着淮南楚文化、安徽楚文化发展的重要契机,昭示着未来淮南楚文化、安徽楚文化发展的广阔空间和光明前景。

余论

围绕淮河流域、淮南地域楚文化发展的情况,系统研究“淮楚文化”的学理概念、历史脉络、具体内容、基本特点、学术地位及价值影响,无疑是当前十分值得学界高度重视和着力开拓的楚文化研究新领域。用“淮楚文化”的学术新概念与学术新体系,激活中国楚文化研究发展的蓬勃活力,为“荆楚文化”“湘楚文化”“巴楚文化”“吴楚文化”等楚文化研究对象带来极富启发意义的重要参照,在比较研究中进一步丰富中国楚文化的学术内涵,这不仅能让学界充分认识到淮河流域楚文化、淮南地域楚文化的特殊价值与意义,且可促动中国楚文化的研究发展更体现其多样化的特点,更能展现出后者博大精深、异彩纷呈的文化蕴涵及精神气象,进而也能从整体上显现出楚文化对中华文明演进发展所独具的重大影响和历史意义。就此来说,“淮楚文化”的学理阐释、学术研究和传承发展,或可有所期待,在不远的将来,相信其能为中国楚文化的推陈出新、弘扬光大,添写上特色鲜明、浓墨重彩的一笔。

参考文献:

- [1] 柏松.从荆楚文化到“淮楚文化”——访淮南市史志工作者、文化学者姚尚书[N].安徽日报,2024-04-17(5).
- [2] 张正明.楚文化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导言:3.
- [3] 张正明,刘玉堂.荆楚文化志[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4.
- [4] 邹文生,王剑.陈楚文化[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20.
- [5] 陈得时.寿春楚文化[M].合肥:黄山书社,2000.
- [6] 陈得时.江淮楚文化[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17:2.
- [7] 李霞.生死智慧:道家生命观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17-23.
- [8] 高旭.大道鸿烈:《淮南子》汉代黄老新“道治”思想研究[M].成都:巴蜀书社,2020.
- [9] 魏昌.楚学札记[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3.
- [10] 王建辉,刘森森.荆楚文化[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6-7.
- [11] 刘和惠.楚文化的东渐[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
- [12] 王生铁.楚文化概要[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13.
- [13] 刘玉堂.荆楚文化通议[J].湖北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4(2):4-16.
- [14] 陈广忠.四论淮楚文化:淮夷、荆楚与交融[N].淮河早报,2024-07-02(A4).
- [15] 高旭.晚楚流韵 淮风悠远——“淮南楚文化”的历史特点[N].淮南日报,2024-06-04(3).
- [16] 李松.讲好安徽楚文化故事[N].安徽日报,2024-08-06(6).
- [17] 岳葆春,姚尚书,王家运.何以淮楚 只此淮南——散论淮楚文化中城市精神的提取与培育[N].淮河早报,2024-09-26(A1).
- [18] 劳贞一.秦汉史[M].上海:中国文化服务社,1947:10-11.
- [19] 马超骏.淮楚文化的特质[C]//淮南市历史文化研究会.淮安历史文化研究(第一辑).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25-27.
- [20] 胡健.文化淮安断想[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6.
- [21] 徐四海.江苏地域文化[M].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23:150.
- [22] 洪泽县文化志编纂委员会.洪泽县文化志[M].北京:方志出版社,2012:69.
- [23] 《中国·文化淮安》编委会.中国·文化淮安[M].天津:天津大学出版社,2012:36.
- [24] 高旭.“淮楚文化”刍议[N].淮河早报,2024-06-27(A2).
- [25] 高旭.“淮楚文化”再议[N].淮河早报,2024-07-25(A3).
- [26] 张正明.楚文化志[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8:1-21.
- [27] 魏昌.楚国史[M].武汉:武汉出版社,2002:10.
- [28] 张正明.楚史[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43.
- [29] 李玉洁.楚史稿[M].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88:130.
- [30] 左丘明.春秋左传集解[M].杜预,集解.李梦生,整理.南京:凤凰出版社,2020:658.
- [31] 郭学东.走读淮河——淮河北过渡带文化考察[M].合肥:黄山书社,2017:6.
- [32] 高旭.四议“淮楚文化”[N].淮河早报,2024-12-26(A3).
- [33] 李琳琦.淮河(淮南)文化十五讲[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2.
- [34] 马道阔.谈蔡侯墓[J].文物研究,1988(3):50-52.
- [35] 淮南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淮南市志[M].合肥:黄山书社,1998:8.
- [36] 淮南市地方志办公室.淮南市志(1978~2005)[M].合肥:黄山书社,2012.

- [37] 淮南市地方志办公室. 走进淮南(2013)[M]. 合肥: 黄山书社, 2013: 2.
- [38] 姚尚书. 淮南历史漫步 [M]. 合肥: 黄山书社, 2016: 55.
- [39] 《走进安徽》编委会. 走进安徽(2010 版)[M]. 合肥: 安徽人民出版社, 2010: 99.
- [40] 冯少茹, 朱明峰, 贾志海. 资源型城市发展生态旅游探索——以淮南市为例 [M]//刘登义. 生态安徽的理论与实践. 合肥: 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2004: 69-73.
- [41] 淮南市地方志办公室. 淮南概览 [M]. 合肥: 黄山书社, 2009: 2.
- [42] 中共淮南市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 淮南概览 [M]. 合肥: 黄山书社, 2024: 31.
- [43] 《读懂淮南》编写组. 读懂淮南 [M]. 合肥: 安徽人民出版社, 2024: 9.
- [44] 《安徽年鉴》编辑委员会. 安徽年鉴(2022)[M]. 合肥: 《安徽年鉴》编辑部, 2022: 447.
- [45] 《安徽优秀传统文化丛书》编写组. 皖北文化九讲 [M]. 合肥: 安徽大学出版社, 2015: 112.
- [46] 李霞. 论楚淮文化对道家生命哲学形成的影响 [C]//程必定, 魏捷. 淮河文化新探: “第三届淮河文化研讨会”论文选编. 合肥: 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2006: 67-74.
- [47] 董晓红. 庄子生命哲学的酿生及其社会效应 [M]. 芜湖: 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9: 25-29.
- [48] 张启华. 六安大辞典 [M]. 合肥: 安徽人民出版社, 2011: 1795.
- [49] 钱坤. 古寿州考略 [M]//谢昭新, 张器友. 地域文化与文学艺术创新. 合肥: 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2013: 68-75.
- [50] 丁继龙. 试论寿春楚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C]//楚文化研究会. 楚文化研究论集: 第十一集.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5: 561-565.
- [51] 刘睿. 考古安徽 [M]. 合肥: 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2016: 70.
- [52] 张钟云. 安徽地区楚文化的研究与展望 [J]. 东南文化, 2001(7): 16-21.
- [53] 刘玉堂. 荆楚文化史 [M]. 武汉: 湖北教育出版社, 2022.
- [54] 安徽大辞典编纂委员会. 安徽大辞典 [M]. 上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 1992: 1.

[责任编辑: 范 君]